

垃圾分类
要用“绣花功”打持久战

本报记者白靖利

在百姓看来,他们是党纪国法的护卫使者;在“老虎”“苍蝇”眼中,他们是不留情面的“黑脸包公”;在家人朋友心里,他们却是总在加班办案的“工作狂人”……

十八大以来,中央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不停歇,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则成为反腐主力军。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达到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一串串数字背后,离不开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的艰辛付出,而他们自己又有哪些心声?

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什么时候来

“想叫你聚餐怎么这么难?”“你怎么总是在加班?”这是许多纪检干部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云南一个县级纪委有123名干部,但每年都要被抽调约80人次参加各种督查,还有7人在脱贫攻坚督查专班,剩下四十多人不得不满负荷运转。随着监督范围的拓展以及信访渠道更加畅通,人手不够的困境更加突出。云南省宣城市纪委书记普靖介绍,监察体制改革后,虽然人员增加了23%,但与此同时,监督面扩大了15倍,信访举报量增加了4倍。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每名办案人员每年要办50件左右的信访件,根本忙不过来。尤其是一些督办件和催要结果件,时间紧、任务重且不容许任何错误。”普靖说,一个案子从受理到结案自己要签7个字,至少开三个会。“每一个程序都不能出问题。”

人少案多,许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不是在办案就是在办案的路上”,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更让许多基层办案人员身心俱疲。“我感觉随时处于一种焦虑和焦躁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什么时候会来,我要怎样才能做好下一个任务。像是在无休止地解题,而且要把每道题都答好。”一位县级市纪委书记说。

花费大量时间查证一个“诬告”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县级纪委监委室主任的孩子才两岁,但是他一直加班,每天晚上十点前回家都很奢侈。有一段时间,爱人把孩子交给他来带,而他不得不带着孩子到办公室加班。于是,过往的人员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两岁的孩子捧着手机看动画片,一名中年男子则在一旁拼命地赶材料……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委屈和心酸远不止于此。多名干部开玩笑地说道,进了纪委以后,自己的朋友少多了。“有问题的干部躲着你,其他朋友约个饭、打球球你也总是失约,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嘛。”滇南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说。

在云南东北部一个小乡村,两名村干部发生了争执,其间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两人被村民劝阻。没想到当天晚上,其中一名村干部就被人向中央纪委网站举报为黑恶势力。随后,举报线索被层层批复下来,当地纪委立即派出三名干部到村里调查,正在另一个村子从事产业扶贫的镇党委书记也不得不抽身过来。经过对当事双方和多位村民的调查,举报的黑恶势力为子虚乌有……

花费一天时间,就查证了这样一个诬告嫌疑极大的情况。这类案子很多,有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举报有问题,但是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去查证,还要及时、充分反馈。”一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

记者在多个基层纪委了解到,由于目前举报渠道通畅,举报成本很低,各地普遍面临“举报失实比例居高不下”的困境。匿名举报加上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让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十分无奈。一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询问记者:“有没有可能设立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长期、多次恶意举报者也能受到应有的惩处?”

有刀刃向内的意识和决心

虽然偶尔会“吐槽”工作压力大,但是每办完一个案子、揪出一个“贪官”,纪检监察干部们还是会充满成就感。“去年3月到年底,我们就办了超过1200个信访件,挖出一个窝案,还查处了多名涉黑的干部。”宣城市监委委员黄初亚说。

“谁来监督纪委”是许多人长期的疑惑,受访的纪检监察干部们也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有18项内部管理制度,对于违纪违法的纪检干部,处理绝对比其他干部更为严厉。”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纪委副书记李立斌说,每名纪检监察干部都必须有刀刃向内的意识和决心。

但是,不断增加的职能和机构,也让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意识到,不断完善制度才能更好地回答外界的质疑。一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期盼着《监察官法》等配套制度尽快出台,让自己作为监督者更有力量和底气。

随着监督体系的日益完善,过去容易被忽视的乡镇、村组等“最后一公里”如今也实现了监督全覆盖。但与此同时,乡镇监督专业化程度不够、监督水平有限等问题也摆在桌面上。一名乡镇纪委书记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对这一领域不熟悉,为了做好纪检工作硬着头皮“恶补”了许多知识,办理了几个具体的案子才感觉“入了门”。

“对于我们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普遍面临专业化水平不够的问题,更多时候都是靠自学,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普靖说。

云南省纪委常委李庆元认为,纪检监察干部需要严管,也应得到“厚爱”。记者了解到,湖南、云南、江西等多地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诊疗等方式为纪检监察干部减压。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建议,尽快建立心理健康预防疏导工作机制,及时疏导、排解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理压力。

听听一线纪检监察干部的心声

分红式扶贫:警惕结了“富果”未除“穷根”

本报记者李雄鹰、周楠

帮扶单位购买种牛种羊,交由企业或合作社集中管理,贫困户全程不参与,到了年底坐等分红;小额贷款信贷,钱不给贫困户,统一由企业使用,贫困户定期“领”利息;用于发展产业的财政资金,最终被买了商铺,每月将租金返还给贫困户……

类似简单化“分红式”扶贫,考核上“立竿见影”,但由于容易助长一些贫困户“坐享其成”的等靠要心理,自我发展能力并未同步提升,“富果”虽结,但“穷根”难除。

多地扶贫干部和相关专家认为,由于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众的情况千差万别,“分红式”扶贫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不能一刀切否定。但随着精准扶贫临近收官,“救急”的任务接近完成,应更多地考虑长效,特别是在后续资金管理上,要提早出台政策,做好相关指导。

不出钱也不出力,“坐享其成”

记者日前在西部某贫困村采访时发现,几个被村民认为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靠财政奖补资金、小额贷款入股村里合作社或企业帮扶的产业项目,自己不出一分钱,不出一份力,即可获得每年上千元收入。

在一个村里有名的“懒汉”家中,记者试着问该贫困户,是否会利用“分红”得来的资金,用于发展自家的产业,该贫困户回答:“有了就花掉,哪管以后。”

南部某贫困县统筹使用用于产业发展的扶贫资金,将部分资金投入建设商铺,商铺建成后用于出租,出租收益用于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村集体分红。但记者了解到,这栋商铺大楼实际还在建设中,并未产生任何收益。但该县却在去年就已经给贫困户和村集体“分红”。

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类似这种“分红式”扶贫,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全国各地的产业扶贫中。一些地方投资建设水电站、光伏发电,所得电费收入用于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直接入股到当地企业,签订协议,资金使用方每年按照一定比例,固定给贫困户和村集体支付利润,协议到期后,再收回本金;一些帮扶单位出钱购买牛、猪、仔,然后由企业集中喂养,年



“分红式”扶贫 新华社发

底时给贫困户分红;一些地方将产业扶贫资金用于购买商铺,商铺出租所得收益用于贫困户分红……

类似“分红式”扶贫,在扶贫资金集中使用、更有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却助长了一些贫困户的“坐享其成”心理,扶贫却未“扶志”。

一些贫困户“一问三不知”

记者走访多位贫困户家中发现,家中扶贫手册上注明了入股分红项目和具体金额,但贫困户对这些项目、产业几乎“一问三不知”。

多名基层干部担忧,这种“分红式”扶贫,贫困户参与较少甚至完全不参与,无法让贫困户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与通过产业扶贫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仍相去甚远。

“扶贫仍是包办,贫困群众反而变成旁观者,只是坐等分红,本质上与直接送钱给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南方某省一名扶贫干部如

此评价。

一些扶贫干部也坦承,不用参与劳动就可以享受分红,客观上也会在贫困户之间造成不公平影响,也容易滋生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

与此同时,简单的分红,对长效脱贫也带来隐患。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分析,一些贫困户虽然现在每年有固定分红收益,实现了脱贫,但一旦签订的协议到期,企业或合作社停止分红后,这些贫困户很可能再次返贫。

除对贫困户内生动力产生消极影响外,部分基层干部与专家学者还担心,这种分红式或资产性收益扶贫模式,在后续资金管理上存在一些风险隐患。

“这些‘分红式’的扶贫项目,本金如果是通过小额贷款,签约到期后,企业还可以直接还给银行,但如果是帮扶单位筹集或是财政下发的扶贫资金,签约到期后,这些本金归属谁?企业在经营出现一些问题后,又该如何应对?村里建设的光伏发电、水电站等有固定收

西部脱贫“冲刺”要补三大短板

本报记者杨静

脱贫攻坚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各地扶贫干部都忙着脱贫“冲刺”。记者走访西部多个贫困县,发现部分贫困地区在夯实脱贫基础、补齐脱贫短板的同时,依然面临产业联结机制难构建、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平衡、教育资源难跟上三大短板,可能对脱贫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扶贫产业如何可持续

产业发展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防止返贫的压舱石。为让贫困户有增收产业,同时保证村集体收入,2017年西南某贫困村开始发展羊肚菌种植,由村里提供光伏大棚,引进种植企业,并约定分红比例。

去年底,记者再次来到该村时,大棚没变,种的作物却由羊肚菌变成了“多肉”植物。“企业挣到钱就跑了。”当地干部无奈地说,正如当初担心的那样,企业盈利后就跑了,根本不是踏踏实实来扶贫的。

“我们汲取教训,明确企业如要在大棚种植,除给村民流转费、村集体分红外,还要雇佣多少工人、教会多少村民种植多肉的农业技术

等。”该干部说,只有企业诚心来发展,政府才真心来支持。

事实上,在部分贫困地区,地方政府虽然有产业选择的权力,但在如何构建贫困户与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并没有多少话语权,企业每年盈利了多少,给贫困户分红多少全靠企业“良心”,这使得贫困地区要真正发展可持续、同受益的扶贫产业比较困难。

“现在产业发展思路比较保守。”西南某乡镇扶贫办主任说,目前想要资金的合作社比较多,但是我们不太愿意给,我们要评估风险,因为文件要求产业资金不能有任何损失,这就意味着集体资金投入的本金不能有损失。但研究产业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她觉得大部分产业扶贫没有被盘活,比如统一一种养殖关键是要确定销路在哪里,通过党支部、专业合作社的成功率高一点,如果行业不看好,管理出现有不妥的地方就没法给贫困户交代。

“生态红利”如何真变现

位于西南某村的水库是市里的水源地,为了保护水资源,村里85%的土地都退耕还林了。此前,当地通过“天保工程”“市级农改林”来补贴村民,但由于“天保工程”补贴到

教育扶贫如何补软件

精准脱贫以来,各地都加强了教育的投

入,尤其是强化了教育的硬件投入,贫困地区的教育硬件得到较大提升。相比之下,教育理念、师资力量等软件资源显得捉襟见肘。

去年,因为“一块屏幕”,云南省禄劝县时隔多年有本地高中生考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这块屏幕就是当地与成都七中开展的网络直播课程,学生可在本地就能享受成都七中的教学资源。

“全县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禄劝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脱贫攻坚以来,当地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教育硬件短板逐渐被补齐。他认为,教育的硬件条件只是帮助学生成才的一个方面,他们更需要优质的教育资源。

“我们同样面临诸多困境。”王开富说,一段时间内,一些家长宁愿花费更多,也要将孩子送去昆明的学校,因为家长认为昆明的教育资源更好,不仅留住优秀的教师,连优秀的初中毕业生都难留下。

记者在多地调研时看见,各贫困地区的教育硬件短板逐渐被补齐。有教育专家建议,上级部门可加大教育资源统筹力度,促进优质教育向西部地区、贫困地区流动,缓解这些地区的优质教育紧缺问题,为后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吸循环衰竭而亡。冠心病促进了死亡的进程。

案件发生后,五原县公安局领导赶赴现场并上报上级部门,纪委监委、检察院同步介入,通知并向死者家属播放了全程监控视频。

五原县公安局党委对分管副局长和派出所所长作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处理,对带班教导员予以禁闭,对3名工作人员予以停止执行职务,配合调查。同时,县公安局开展了提升执法能力的培训,并对全县执法办案场所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就公安干警是否存在渎职行为,五原县人民检察院及时进行调查取证,依法办理。7月3日上午,检察机关收到重要书证——司法鉴定意见书后,依据查处情况,决定对五原县公安局西环派出所的一名干警、两名协警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

门边大声制止,此时张关利第二次用头撞墙,随即倒地昏迷。看护人员随即叫来同事一起察看伤情,并拨打120请求急救,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张关利已无生命体征。

根据候问室监控视频,张关利第一次撞墙时间为18时53分48秒,第二次撞墙时间为18时53分54秒。

为进一步查明死因,公安机关在征得死者家属同意后,于6月1日委托内蒙古迪安恒正司法鉴定中心对死者进行法医病理学尸体解剖检验鉴定。

7月2日18时,五原县公安局取回该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7月3日向死者家属送达了鉴定意见通知书和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张关利在醉酒状态下,用头部撞击墙体,致使颈髓损伤,终因急性呼

内蒙古五原县非正常死亡案件死者死因公布

新华社记者刘懿德

3日晚,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西环派出所非正常死亡案件中死者张关利的尸检报告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已对该派出所3名工作人员立案调查。

据新闻发布会通报,2019年5月30日17时40分,五原县公安局西环派出所接到110指挥指令称:瑞京摩尔城有闹事者关掉工地电闸,扰乱正常施工。

处警人员到达现场,调解未果,依法将张关利及工地负责人王某带至派出所。首先对王某进行询问,对张关利进行人身安全检查后将其带进候问室等候询问。

在候问过程中,张关利提出要抽烟的要求,被拒绝后,张关利突然用头撞墙,看护人员边开